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孙子

译注

蒋玉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蒋玉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子译注/蒋玉斌译注. —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11
(二十二子译注全译/韩格平等主编)
ISBN 7-207-04394-5
I. 孙… II. 蒋… III. ①孙子兵法—译文 ②孙子兵法—注释 IV. E8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0257 号

责任编辑: 李文方 吕观仁 柴力明
装帧设计: 叶 方

二十二子译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孙 子 译 注

Sunzi Yizhu

蒋 玉 斌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1 240 毫米 1/32·印张 6 4/16
字 数	180 000
印 数	1~3 3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4394-5/B·134

定价: 10.00 元 (全套定价: 509.1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

主 编 韩格平 董莲池

副主编 张玉春 李守奎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二十二子详注全译》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陈春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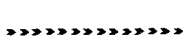
副主任 韩格平 董莲池

委 员 李文方 柴力明 吕观仁 王彩云

高长山 李德山 赵宗乙 孟庆祥

金 玲 刘 柯 李之亮 高忠良

高丽芳 孟繁红



总 序

子书,泛指我国古代学者阐发个人学术观点的著作。《文心雕龙·诸子》:“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原本是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可以用来称呼有名望、有地位的官员,也可以用来称呼有学问、有德行的师长,于是,许多学者的著作也以“某子”作为书名,如《老子》、《庄子》、《管子》、《墨子》等。我国古代第一个子书创作高峰期在春秋战国时期。其时“生齿繁而竞争烈,交通便而知见深,腐败深而衅漏见,五帝三王之陈迹渐不足以约束当时之社会,于是聪明睿知之士,李耳、孔丘、墨翟诸人相继迭起,而学术思想之发展遂达于全盛时代”(钱玄同《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要·序》)。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剧烈的社会大变革,是其时诸子之学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及其相关著作。后世文人继承发扬了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注时政,潜心钻研,著书立说,撰写出大量个人学术著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体系。这些子书,在我国浩繁的古代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奉诏校理皇室秘府藏书,分别撰有书目文献《别录》、《七略》。东汉班固删取刘歆《七略》成《汉书·艺文志》,其中《诸子略》著录当时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类著作共“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兵书略》著录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术数略》著录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等类著作“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著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类著作“三十六家,八百



六十八卷”。《隋书·经籍志》卷三“子部”将《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共著录当时存世子书“八百五十三部，六千四百三十七卷”。此后，历代公私目录对子书均有详细著录，王应麟《玉海》、马端临《文献通考》等含有宏观评述前代子书内容的著作亦历代有之。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馆臣将子书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共十四类，收录子书 924 部，17 893 卷；子书存目 2 008 部，41 318 卷，从中可以反映出乾隆年间我国子书的基本规模及大致内容。

为了更好地提高研读实效，古代学者尝试在卷帙浩繁的子书中选编精华。他们或摘取诸子名言警句、精彩片段汇编成诸子语录之书，如梁庾仲容《子钞》、梁沈约《子钞》、唐马总《意林》、明陈深《诸子品节》之类；或选录数子、数十子全文编辑成一部诸子丛书，如宋汪氏《曾思二子全书》、明许宗鲁《六子书》、明周子义《子汇》、清崇文书局《子书百家》之类。在现存的古人编辑的诸子丛书中，浙江书局于清光绪初年至光绪三年分册辑刊而成的《二十二子》较有特色。

首先，该书所收子书具有较高的代表性。中国古代子书内容宏富，真可谓“博、大、精、深”。其中，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兼及中国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天文学、军事学、医学等等。研读子书，应该从先秦子书入手，方能理清诸多学派的各自源头。《二十二子》所收先秦子书，如《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等，均为先秦诸子百家的代表作，这些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范畴。同时，《二十二子》还收录了《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列子》、《文中子》、《孔子集语》等后人完成的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丰富和发展了先秦诸子的学术主张。这样，通过《二十二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子书的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脉络，有助于人们从较广的学术视野观察中国古代文化。

其次，该书对于今人研读中国子书具有较高的实用性。我国古代子书数量太多，今人在汗牛充栋般的子书中择取精华实属不易。为了



二十 二 子 详 注 全 译 · 总 序

方便读者,《二十二子》尽量做到精中选精。如法家著作收录了《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则不收《慎子》;兵家著作收录了《孙子》,则不收《吴子》。同时,该书尽量保持了较宽的学术覆盖面,不仅收录了儒、道、法、墨、兵、杂诸家与思想史、文化史关系密切的重要著作,还收录了《黄帝内经》、《山海经》、《竹书纪年》这些其它诸子丛书一般不收的重要著作。这样,《二十二子》博而不杂,分量适中,便于今人研读与收藏。

第三,该书刻校精良,在文字内容上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古书流传至今,多有衍脱误倒之类的讹误。为此,浙江书局对于各种子书的底本选择甚严,所用底本均为精刻精校本。如《老子》选用华亭张氏本、《庄子》选用明世德堂本、《管子》选用明吴郡赵氏本等。在此基础上,浙江书局组织人力认真校勘。除《韩非子》与《春秋繁露》由董慎行一人校勘外,其余诸书均设一名主校,两名分校。其中,担任主校的有:王诒寿,字眉子,浙江山阴人,曾任武康训导,好古文,精骈文,撰有《缙雅堂文》、《笙月词》等;黄以周,字元问,浙江定海人,同治举人,曾任分水训导、南菁书院主讲、处州教授、内阁中书等,学识渊博,著述颇丰;杨文莹,字雪渔,浙江钱塘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之职,等等。邀请如此众多学者从事一部数百万字书籍的校勘,在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史上实属罕见。正是这些知名学者的直接参预,为《二十二子》的刊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看,《二十二子》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将《论语》、《孟子》视为经书而未予收录;受《汉书·艺文志》及《四库全书》的图书分类影响,将地理类著作《山海经》以小说类子书收录该书;将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收录该书;各部子书未按其流派排序,稍显杂乱等等。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二十二子》仍然是目前较为实用的一部诸子丛书。

目前,许多青年朋友直接阅读子书古文原著比较困难,有鉴于此,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组织所内外专家学者对《二十二子》进行了注释与今译。四年来,注释者们尽量吸取前人研究成果,付出了辛勤劳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吕观仁先生认真审阅书稿,多次提出修改意见。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本书近日甫告杀青。限于学识水平,本书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作为古籍所现任领导,我们忝列主编,理

二 十 二 子 详 注 全 译 · 总 序



应承担接受各方批评之责。如果本书能够对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子书风貌有所裨益,我们将感到些许欣慰。

韩格平 董莲池

二〇〇二年八月于长春



前言

《孙子》一书，即《孙子兵法》，又称《兵法》、《孙武子兵法》、《吴孙子》、《吴孙子兵法》等，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杰出的兵学著作。全书仅有五六千字，但它从问世以来，就以其睿智而富有思辨性的思想吸引着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领域的人们。人们称它为“兵学圣典”，称它的作者孙子为“兵圣”，称它的思想为“军事哲学”，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解读中得到了若干的启示。尽管《孙子兵法》本身并不可能换来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价值，但它深邃的思想足以启发人们的智慧。这些新开发的智慧是无穷的，其创造的价值也是无穷的。正如李零先生所说：“它留给我们的与其说是实践的指导，倒不如说是智慧的启发。”^①

那末，就让我们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去接受这发蒙益智的洗礼吧。

一 《孙子》的作者与成书

传统上认为《孙子》的作者是孙武。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又说：

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明确告诉我们，孙子名武，本是春秋末期齐国人，带着所著十三篇兵法去见吴王阖庐（公元前514～前486年在位），被任用为将军。后来



在吴国伐楚,兵威齐、晋等军事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详见本书附录之一)。

此前一些典籍也提到过孙武的事迹。《尉繚子·制谈》:“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是也。”“武子”所指应当就是孙武。《韩非子·五蠹》:“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一般认为,所藏之书就有《孙子兵法》。

确切地说,《孙子兵法》应称为《吴孙子兵法》(名见《汉书·艺文志》)或《吴孙子》。因为历史上本来有两个“孙子”,除了上面说的孙武,还有一个孙臆。孙臆,战国中期人,《史记》说他是孙武的后世子孙^②。他做过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在位)的军师,孙(臆)庞(涓)斗智、孙子臆足(挖去膝盖)、田忌赛马、减灶行军等故事都是有关孙臆的。汉代既有《吴孙子兵法》,也有《齐孙子》一书(见《汉书·艺文志》)。齐孙子就是孙臆,只不过他的书至迟在东汉以后就失传了^③。

从北宋开始,就有人怀疑《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末期的书,因为其中说到战争规模,动辄“出兵十万”、“相守数年”等,这都是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详见下文);又有人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因为《史记》所记简略而像是小说,不可尽言,《左传》载吴楚之事甚详,却没有提到曾为吴国霸业做了不少贡献的“孙武”。由于有这些怀疑,又加上《齐孙子》一书早佚,晚近一些学者于是认为《孙子兵法》为孙臆所著,“孙武”是孙臆的异名(如梁启超、钱穆、金德建,日本的斋藤拙堂、武内义雄等)。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包括《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在内的大批竹简,有的竹简上有“吴王问孙子曰”的字样,有的又写有“齐威王问用兵于孙子曰”。吴王即前述春秋末期的吴王阖庐,齐威王则是战国中期人,他们分别问兵法于“孙子”,这就直接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臆各有其人,又均有一部兵法系于各自名下。银雀山竹简的出土,使不少疑案涣然冰释了。

既然历史上确有一部归于孙武名下的《孙子兵法》,是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孙子兵法》就是他亲手写成的呢?

西汉竹简本(以下简称“汉简本”)给我们另一个启示,就是《孙子兵



法》一书不会全部是孙武亲手所著。今传本《用间篇》“昔殷之兴也，伊挚（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汉简本此下多出两句，其中有“燕之兴也，苏秦在齐”的记载。苏秦在齐国作间谍而画燕兴国，是战国后期（公元前284年左右）的事，距孙武的时代已有二百多年了。这样的内容当然不会是孙武写定的，而极有可能是孙子后学或读者添加的。

银雀山汉简中，还有几篇短文，是注释或阐明《孙子兵法》的，如《四变》是注《九变》相关文字的，《黄帝伐四帝》是注《行军》“黄帝之所以胜四帝”的，《地形二》也应该是注《地形》的。这些当是孙子后学所作。这些注释或阐明文字没有在传世的版本中固定下来，这反映了《孙子兵法》的成书应有一个长期的修改附益的过程。

前面已经提到，《孙子兵法》中有不少表现战国特征的内容。以前学者怀疑孙武不会写下这些内容，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春秋时期，战争规模都比较小，而《孙子》一书，动辄出兵十万，近人齐思和以为这是战国才出现的。李零先生进一步考证，从《吕氏春秋·用民》“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的话来看，战国初期的战争规模也比这十万之数小得多；直到战国中期，齐魏马陵之战才用兵十万^④。同时，《孙子》中几次提到战争的旷日持久，如《谋攻篇》中攻城之前的准备工作就有六个月之久，《用间篇》说用战“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春秋诸国没有足够的国力支撑这种战争。这也说明《孙子》一书可能有孙武后学根据孙武主要思想以及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的润饰加工。另外，此书每篇均以“孙子曰”打头，“子”是对男子的敬称，尤其作为某一学派传承中门人、弟子对师长的尊称，很明显，这也是后学整理的印迹。

那么，能不能说孙武是这本书的作者呢？我们认为，严格地说，他是作者之一，或者说是主创者。尽管书中有不少后来整理加工的地方，但全书的大体框架、思想脉络还应该是孙武提出的。他很有可能只是形成了自己的学说体系，并传授学生，但没有写下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从孔子述《论语》到西汉前期的经师传经，多是这样。在下面的介绍中，我们还会了解到春秋末期是完全具备产生《孙子》主体思想的各种因素的。而从现存《孙子》本身看，“《孙子》书中出现的可以确认为战国



以后特色的文字是个别现象,而且如果我们将这些文字从原文中去掉,会很惊奇地发现,全书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几乎未受任何影响”^⑤。此外,书中有“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虚实篇》)以及“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九地篇》)这样的话,分明是站在吴人立场上说的,似乎也只能出自孙武之口。

总起来说,《孙子》一书,是系于孙武名下的学派著作。诸子百家的作品,很多都是这样。吕思勉先生说过:“‘子’为一家之学,与‘集’为一人之书者不同。”^⑥可谓一语中的。《墨子》的后半部分,《庄子》的外篇、杂篇,都不是墨子、庄子所作,但并不妨碍传统上以二人为作者。因此,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孙子》作者就是孙武。《论语》一书是孔门弟子记述师长言行的,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孔子的思想来研究。所以,我们也可以大致认定,《孙子》一书反映的是孙武的思想。

关于《孙子》一书具体的成书过程与成书时间的研究,目前还在深入。

汉简整理本《孙臆兵法·陈忌问垒》后附有一枚残简:“明之吴越,言之于齐。曰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整理者注释说,这大概是把孙武、孙臆的军事理论作为一家的学说看待了,因为兼包两个孙子,所以才称孙氏。从这一点出发,李零先生早就指出,《孙子》的成书过程“大约是从春秋末期的吴国开始,到战国时期的齐国,经过长期整理最后完成”^⑦。又说,“题名作者的主要活动虽在吴国,但成书当是在齐国,书中很多内容和辞句与齐系统的《管子》非常接近”^⑧。

郑良树先生根据《尉繚子》、《孙臆兵法》二书对《孙子》的暗用、明引,以及袭用其理论、语汇、句型、观念,发挥其思想理论等,如《尉繚子·将理篇》“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银雀山汉简《尉繚子》“兵法”作“兵策”)、《孙臆兵法·十间》“攻其所必救”均属袭用《孙子》之言(《用间篇》、《虚实篇》),认定《孙子》成书在二书之前;又根据《吴问》的年代(郑氏定为公元前453~前403年),推断《孙子》的撰成时代在公元前453年前后^⑨。

近来何炳棣先生则通过对《左传》中以晋国为核心的史事等的分



析,尽量深入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的社会环境中,从而认为佚篇《吴问》是对晋国未来作的预测,与《孙子》十三篇都作成于吴王阖庐三年(公元前512年)。这一时间早于《论语》的编辑完成,因此何氏就认为“《孙子》为中国现存最古的私人著述”^⑩。

我们认为,要把《孙子》思想产生的时代和《孙子》成书的时代分开来谈。《孙子》思想主要是孙武的,是属于春秋末期、战国初年那个时代的(详见下文);而《孙子》的成书要滞后于孙武的学说,某些部分很有可能在成书之前有一个口传阶段,而在成书过程中又加入了后人的东西,一直到战国中期才趋于定形。这是十分符合先秦子书的成书过程的。李零先生说此书最后完成在齐国,也是很有可能的。

二 时代变革中的《孙子》思想

《孙子》主体思想所反映的春秋末期、战国初年那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东周王室势渐衰微,各方诸侯奋力并起,处于一个旧的社会秩序行将瓦解,新的社会秩序尚未明朗的阶段。

首先,军事的物质层面有了较大变革,战争的复杂化要求总结一套科学、实用的系统军事理论,并为这种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周王室对诸侯国控制力的减弱,较大诸侯国国力和独立性的持续增强,各方面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这一时期的连年征战。有人统计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294年中,共发生有确切记载的战争384次^⑪。战争频仍与激烈程度的增加,必然使对战争的总结研究深入下去。

随着各国实力的增强,兵力也逐渐增长。此外,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春秋中期以前,战争一般以车战为主,战场需选在平旷之处,自然受到很大局限;后来,步兵兵员的扩大与战斗力的增强,使战争发展为车战与步战相结合的方式。步战具有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作战方法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迂回、侧击、包抄、设伏、奇袭等作战方法纷纷登上战争舞台,要塞战、城池攻防战等作战样式也初步进入了角色”^⑫。《孙子》智慧的一大特点就是随机应变,这与上述作战方式、



方法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战争前中后各阶段的外交攻势,也为各国所重视。它们一方面通过制造舆论,宣扬自己的正义或无辜,一方面用各种手段联合自己的盟友,并离间对方盟国。战争不但是政治的继续,也把政治、外交作为自己的手段。《孙子》一书中多次讲到“伐交”、“衢地合交”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上述种种军事上的变革,使春秋末期以来的战争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趋势。战争的频繁、兵员的增加、多种战争方式和手段的综合运用,既要求战争指挥者具有较高的才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又为其经验的积累提供了可能。尽管当时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各国国力都有所提高,但兵力和物资的激增总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巧妙地运用各种手段调动现有的军事资源,取得胜利并减少损失,就成为军事研究中十分关键的内容。因而运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制造机变,创造一种不可定的态势,争取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全胜,也就成为《孙子》一书所追求的境界。

具体到军事领域,直接影响孙子思想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孙子》时代的一般军事思想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社会上的一般军事思想有两大特点:

一是战争中的贵族战法。战争讲究正义,主战者总是打着助小济弱、匡扶周室或攘除外夷的旗号。而战争中的每个环节,也是必讲军礼,比如公元前589年的齐晋鞍之战,齐国的邴夏向齐顷公请求射杀晋国的贵族将领韩厥,顷公就以“非礼也”之由未许;而当晋军要俘获齐顷公时,还得拜两拜,向他行稽首这种最恭敬的跪拜礼,然后捧玉进献,以极为委婉谦卑的口气向被俘的尊者解释,说明逮捕他是出于不得已^⑬。公元前638年宋国与郑、楚之间的泓水之战,是为后人经常提起、也可能对《孙子》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一次战役。当时宋、楚夹泓水对峙,战役一开始,宋军已列好阵形,楚人正在渡河,尚未渡完。宋国大司马固主张乘势出击,宋襄公不许。等到楚军已渡过河,但还没有摆好阵势,大司马又请出击,宋襄公说:“等他们排好阵势。”楚军排好阵势便打了过



来,宋军本来兵少,被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伤了大腿。回国后,人们都埋怨宋襄公,他却解释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鼓不成列”(君子作战,不再击伤已受伤的敌人,不抓敌军中的老者和孩子。要像古代打仗的,不困敌于险形,不击鼓出击还没有摆好的阵势)^⑬。

宋襄公此举被后人看作迂阔,然而他正是春秋时期讲求军礼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的失败说明,在战争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旧有军事思想都要改一改了。春秋末期,已有不少将领、贤士从战争实际出发,在事实上偏离了贵族战法,成为新型战争观的先声。但直到《孙子》的“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等观念才吹响了挑战旧有思想的号角。

二是,占望卜验在战争预测和决策中起着很大作用。《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春官·筮人》:“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在尚未完全掌握战争规律的时候,人们感觉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在控制着战争的发生、进展与结果,所以他们经常对战争进行占卜。《左传》中记载,春秋时代经常占卜军事。公元前525年,吴国伐楚,楚国令尹(相国)进行占卜,结果不吉。司马(军事首领)子鱼以为,楚、吴同处在长江流域,楚国在吴国的上游,怎么会不吉呢?如果他先领兵死战,大军随后,就可能大败吴军。因此他要求改卜,改卜结果为吉。后来楚军果然大败吴师^⑭。尽管子鱼对战争有自己的打算,还必须改卜一次,由此可见占卜是当时军事决策中不可忽视的环节。

人们还经常占星、占梦预测军事。公元前501年有一次日食,当晚晋国贵族赵简子梦见有童子赤身歌舞,史墨(晋国史官)占验为,六年后的本月庚辰日,吴军会攻入楚国都城。他还利用当时已经兴起的五行说,推出什么“火胜金”,吴国接下来会失败。后来这些事似乎应验了,吴国入楚,之后又被秦国打了回来^⑮。写古书的人可能有些故弄玄虚,但这至少说明,当时占验是很流行的。

孙子在其《用间篇》中告诫用兵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这恰恰说明了祈求鬼神、卜筮算卦、占星推度等迷信做法在



当时军事活动中是有一定市场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专门提出来要求人们避免。实际上，由于《孙子》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它本身也残留了不少阴阳、五行、占验等方面的内容。完全用阴阳、五行、占验等思想解释和指导战争的被称为兵阴阳家，汉简本《孙子·计》篇“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顺逆、兵胜也”，其中的“顺逆”、“兵胜”就是兵阴阳家的术语。又如，《火攻篇》讲火攻要选择风起之日，“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以为月亮靠近四星就有风起，也是根据星辰进行预测的兵阴阳说。清代学者说兵书“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①7}，实际上是十分符合早期兵家与兵书的情况的。

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般思想，葛兆光先生说：“除了实践性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外，最重要的精神性知识大约仍然是殷周时代沿袭下来的，历算与星占为主的天象之学、龟策为主的预测之学、象征为主的礼仪之学，在贵族的庙堂中它们影响了诸侯贵族的观念，在平民的生活中它们主宰了百姓的行为，因而凡是可以介入社会发生影响的知识人，大体都对此有所了解。”^{①8}当时的军事活动，自然是受到了这种知识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知识思想氛围中，诞生了我们下面要说的菁英军事思想与《孙子》思想。

（二）《孙子》时代的菁英思想和菁英军事思想

早期中国的文化知识、学术思想掌握在贵族手中，即所谓“学在官府”。春秋以来，由于周王室的衰微，不少掌握了官府之学的文臣史官流落到诸侯国，同时把学术文化传播开来。这就是所谓“学术下移”。“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①9}，这两种人成为社会大变革中思想传承和创新的先驱。他们兴办私学、创立学说，诸子百家就是其中的菁英，而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哲学轴心时代”亦由此到来。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既是百家之一，也与其他学派有相互影响的关系。

首先，思想领域继承了上古以来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形成一个高峰。《老子》一书揭示了事物的矛盾性，并认为矛盾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老子所讲“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孙子的造势、分合、治气等方



面得到了回应(详下文)。春秋后期以来形成的天道循环、五行相生相克等观念,也启发了《孙子》,即要借鉴自然规律,把有限的资源应用作无限的变数,在变化中求胜;要转化敌我对比,使之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其次,朴素唯物主义的成熟也是《孙子》思想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随着生产和社会经验的积累,人们意识到事物运动是有规律的,一些规律是可以把握的,而天道、神灵是不可尽信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郑子产提出“天道无,人道迹”,诸如此类,均体现了人们力图摆脱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孙子兵法》则明确指出“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而它把战争经验归纳总结出来,并用于指导新的战争实践,这本身便是对上古“占卜决疑”的反动。

社会在变化,战争在变化,人的思想也在产生变化。在这个变革的时代里,在那些善于从战争实际出发、把握了战争的某些特点的军事先驱那里,逐渐萌发了战略战术思想的新芽。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孙子》一书,无疑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吸纳这些新的气息,而它本身,已成长为用户系统总结战争经验的参天大树。下面我们仅举几个《左传》战例,稍作分析,以略显早期军事菁英对《孙子》的影响。

1. 庄公十年(前 684)著名的齐鲁长勺之战,鲁国谋士曹刿建议在齐人三次击鼓后再击鼓进军,理由是:“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僖公二十八年(前 632)晋楚城濮之战,晋臣子犯说楚军“其众素饱,不可谓老”,“饱”就是士气饱满,“老”就是师劳气衰。《军争篇》讲“三军可夺气”,并指出“气”的规律是“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因此“治气”就要“避击锐气,击其惰归”。这都说明我国军事菁英很早就注意到了军队实力与精神状态之间的转化关系,并有意识地总结其中规律,用以指挥战争。

2. 庄公二十八年(前 666)楚军要攻入郑国的城门,由于各国援助郑国,只好退兵。郑人本在逃奔,得知“楚幕有乌”(楚军营帐上落了乌鸦),就停止了逃亡。襄公十八年(前 555)以晋国为首的联军对抗齐